

往 事

○ 陈衍庆（1962建筑）

1938年7月16日，我出生在上海市黄河路的一栋石库门住宅里。1938年8月，我刚刚满月的时候，22岁的父亲陈占祥乘海轮去英国攻读建筑学和城市规划。1949年10月下旬，我和两岁的妹妹陈愉庆，随父母从上海迁至北京。父亲是应梁思成先生邀请参加北京城市规划工作，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。

1955年的夏天，我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报到后，意想不到的的是因入学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，我被取消学籍。此后，我一边养病，一边参加高考补习班。1956年，我再次高考，又被清华录取了，如愿以偿地进了建筑系，开始了六年的大学生活。

六年的大学生活是美好的。清华培育了我，她教育我爱国、爱党、爱人民，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。她教育我要学会历史的观点、唯物的观点、辩证的观点、劳动的观点、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。她向我展示了建筑专业的美好和精深，使我对建筑师与规划师的职业充满期待和向往。在清华有那么多师德高尚、学术精湛、教学有方、爱徒敬业的老师，有那么多胸怀大志、勤奋好学、有义有情、多才多艺的同窗。

六年的大学生活是难忘的。1956年到

1962年，清华和全国一样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政治运动不断。1957年的反右，1959年的反右倾，1960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，阶级斗争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。

我入学后第二年，整个中国掀起反右斗争，50多万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”从全国各地各行业中被“揪”了出来。我父亲也被剥去了“画皮”，当作“阶级敌人”。我作为一名共青团员，别无选择，和党站在一起，公开表态，要父亲“老实交代”。但是，19岁的我，内心充满了矛盾、痛苦和迷茫。

我给我的一位共产党员的姑姑写信，我要告诉她我的痛楚和惆怅，写着写着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讲赞赏共产党的话，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对共产党了呢？我真的搞不明白了。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思考的正确性，检讨我的阶级烙印和小资感情。但是，我搞明白的是，要相信党、跟党走，做党的驯服工具，才能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。

1956年入学不久，我们班团支部宣委楚梦兰就把做“通讯员”的社会工作分配给我了。初始，我给建筑系的黑板报写稿，后来给校刊《新清华》写稿，再后来就到校团委宣传部通讯组当校刊的学生记者了。在《新清华》编辑老师们和团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帮助下，我很努力地工作，

□ 母校纪事

写了许多文章，登在《新清华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等报纸上。例如《好样的共青团员——记红叶与右派分子冯国将的斗争》、《在建筑系插上工农子弟的红旗（曲淑凤）》、《全心全意和党一条心——记建0的肖林同志》、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——记企94共青团员谢秉枢》、《杨洪仕》、《生活的道路——记徐培福的故事》、《七十老人的“青春之歌”——记工程化学系主任张子高同志》、《周总理视察清华大学》、《金日成首相重访清华园》，等等。有的文章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有的是与其他同学合作完成的。每篇稿件的采写过程，都是我学习和提高的过程。我越写越感到党的伟大、正确和光荣。但是，20年后，1979年，拨乱反正，我重读旧作，有些文章令我羞愧，我要向受伤害的无辜的好人们（包括我的父亲）道歉！对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也备感内疚。

二

1962年秋天，我从清华建筑系毕业，与同窗王申如、王伟麟一起到建筑工程部情报局报到。我被安排在由情报局代管的中国建筑学会《建筑学报》编辑部工作。起初是打杂、跑腿，干一些编务活儿。后来分了工，我分管“工业建筑”、“园林建筑”和“学生作业”等栏目的编辑工作。我最乐意干的是能为我母校的老师、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服务，最乐见的是他们的文章在《建筑学报》上散发出油墨的清香。这也许就是我挥之不去的清华情结吧。

1966年的夏天，平静的编辑生活被突如其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搅和了。1969年，建工部机关的干部和家属，坐在硬座车厢里，一路颠簸、辗转，终于在河南省修武县李万公社落脚，挂出“建工部五七干校”的牌子。我在五七干校待了不到一年，1970年初就“毕业分配”了。我分到湖北十堰，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。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在鄂西北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叫做十堰的地方。方圆百里的山区，要建设50多个大大小小的分厂，都为生产2.5吨的载重越野车配套，支援国防，是三线建设的重要一环。整个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筹建由红卫工程总指挥部负责，我被分配在总指挥部下的第一分指挥部。该部设在十堰市马家河水库管理处，任务是保证红卫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。

1973年春节，在完成了二汽援建任务后，我随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回到阔别4年的北京，分配在北京市三建公司生产科当计划员。在建筑公司的12年，是我接触实践、了解工农的12年。我喜欢这里的朴实真诚、吃苦耐劳、精明强干、认真负责、直来直去、风趣幽默的同事。我从这些可敬可爱的平常人的身上学到了许多。我在建筑公司工作的第10个年头，即1980年，我入了党，实现了我在清华求学和在建工部任职期间未竟的愿望。那年我42岁。

1980年，我从公司生产科调到公司下属的第二工区，投入了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工程建设。从施工准备阶段开始，我被安排在“设计联络组”工作，和日本的设计单位与施工总包单位，以及承担施工图设计的中国核工业部设计院进行协调。

从1980年筹建至1984年竣工，“设计联络组”对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通过联络组办理的各种设计变更和洽商就有1000多份。筹建阶段，联络组为日方设计与施工单位建成了一栋约500平方米的两层办公小楼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刀真枪的建筑设计实践，亲自体验了从建筑图纸设计到完成建筑物竣工的全过程。

1984年，当中日友好医院的建筑群在惠新东街拔地而起大功告成之时，中日医院特地向社会开放了几天，有组织地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单位，参观人数过万名。而不可思议的是，接待本次参观的意外收获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三

那一天，我接待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和清华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们，从中日医院的门诊楼、病房楼到康复中心，边走边讲。我讲得很投入，老师们听得很认真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曾经教过我建筑构造课的刘兆丰老师问我：“你愿意回清华教书吗？回清华教建筑构造吧！”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回答说：“我行吗？”他说：

“你建筑系毕业，在施工单位干了这么些年，怎么不行呢？！”我说：“那公司不放我，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只要你同意，清华有办法！”

人事调动是最难缠的。但是，清华通过北京市建工局把我的工作调动问题顺利解决了。我的工程师职称也转为讲师了。

“建筑构造”课采用的是高校统编教材。我到校后，先是跟班听唐益韶、竺士敏等老师的讲课，边听课边备课。除了主讲课程，还要组织习题和作业的辅导课。

“建筑构造”是一门基础性工程技术课，照本宣科会很枯燥。但是，联系工程实例就能讲得生动，引起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。“房屋建筑学”是为土木系工民建专业本科生开设的，除建筑构造的内容，还要介绍建筑学的内容。

构造教研组还负责三年级暑假的“工地实习教学”。每年，要联系十余个工地，工地实习最大的工作量是选择和联系施工单位，最关键的问题是贯彻安全教育和措施。我们组织的十多届的工地实习，近千人次，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只有一起“钉子扎脚”。

后来，在系主任的领导下，开设了“建筑师业务实践”课，在四年级有一个学期，把学生安排到建筑设计单位，随建筑师参加业务实践，内容涉及到建筑方案设计、扩初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和现场服务等工作，要求学生完成一定的设计工作量。

无论是“工地实习”还是“建筑师业务实践”课，我们都从教学的角度，编制了教学大纲，规范了各个环节的教学工作，制定教学工作流程，对学生的考核也有规定和要求。“建筑师业务实践”课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。

1993年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左川找我谈话，要我兼任建筑系1990级的政治辅导员和年级主任。当时的建1990级是三年级，有3个小班，72名同学。我没有接受过专门教育学、心理学以及辅导员、级主任的上岗培训，担此重任，全凭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纵观建90级72名学生，都是好孩子。对北京籍的学生，我基本做了家访；外地

□ 母校纪事

的学生家长通过信件或长途电话联系；每位学生过生日，我会买生日蛋糕和他们同庆；学生生病或住院，我会去看望；学生遇到困扰或麻烦，我会约他（她）到餐厅共餐或聊天；对经济困难的学生，为他们组织结合专业的勤工俭学，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以补生活费用；我们还通过各种活动的机会，表扬好人好事，批评不良行为，树立积极向上的班风。

在院党委领导下，通过党课学习，通过各种工作，建90级的党建工作很有成效。1993年，大三时，全年级只有1名正式党员和2名预备党员以及6名入党积极分子。经过两年多党建工作，1995年在毕业前夕，全年级有正式党员6名，预备党员10名，入党积极分子12名。学生中党员比例由4%上升到24%，入党积极分子比例由9%上升到17%。党员的先锋模范



北京大学燕南园55号陈宅前。前座陈岱孙（大舅），后排左起陈衍庆、唐立苏（妻）、陈晴（子）

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。

这个年级的学习成绩也有进步。其中“乡土建筑研究毕业设计小组”获得1995届清华大学毕业设计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。全年级通过体育达标。在毕业生告别宴会的那一天，正好是我57岁生日。同学们用餐车推出一个特大的120厘米×90厘米的生日蛋糕，上面是“陈老师，我们爱你！”几个大字以及70多位同学的签名。

1995年，送走了建90级毕业生，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左川又找我谈话，说《世界建筑》杂志主编曾昭奋老师要退休了，让我接班当主编，问我“行不行”？当时，我的感觉是“真不行”。虽说我1962年到1969年在《建筑学报》当过编辑，但是，当编辑与当主编是不一样的。《世界建筑》号称杂志社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杂志社具有编辑、通联、出版、发行、广告、人事、财务、公关等等的职能，都由主编直接领导和管理，但实际上在编的专职人员只有5个人，包括了3位编辑、1位广告发行、1位编务，财务由学院财务科代管。当时是季刊，一年出4期，发行量号称上万，是颇受欢迎的专业性刊物。但很少广告，收益不好。从主编担负的责任考量，任务绝对艰巨。另外，从我个人考虑，当教师不坐班，当主编要坐班。我家住朝外东大桥，当教师时，上午到清华讲课，中午在北大燕南园我爱人的大舅陈岱孙教授家午餐和午休，下午就回家了。当主编的话，每天要按时上下班，从东大桥到清华园，每天蹬自行车来回至少3个小时，车轮滚滚，风雨无阻。

新职伊始，当主编的感觉是如履薄

冰。如果刊物质量上不去，刊物周期又长（季刊每年4期），发行量小，广告少，刊物亏本，奖金发不出，刊物就会陷入恶性循环。因此要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，关键是《世界建筑》的团队能够奋发图强，拼命向前。按照党的优良传统“党支部建在连上”，《世界建筑》5位同事中，有2名党员，我们和建筑学院历史教研组是个联合党支部。定期的党的组织生活，会讨论《世界建筑》的工作，给予关心、支持和鼓励，发挥了“战斗堡垒”的作用。同时，杂志社的各项管理也逐渐抓起来，发挥编委会和杂志社领导的作用。在杂志社编辑力量薄弱的情况下，充分利用学院教师和海外校友的资源，聘请特约编辑和兼职副主编协助工作，并且自费招聘编辑。在几年的努力中，《世界建筑》由季刊改为双月刊，又由双月刊改为月刊，缩短了出版周期。版面由16开扩大到国际标准开本，由新闻纸改成铜版纸，全

部彩色印刷。由单一的中文，增加了英文目录，并逐步增加中英双语文稿。在内容上，更加扩展了地域性，建立了一些海外的联络站。广告的客户不断增加，每期达到20多个页码，杂志社做到扭亏为盈，每年可以上交部分利润给建筑学院。刊物发行量也逐步上升，号称2万多份。

2001年，我从《世界建筑》主编岗位退休了。

我在清华工作期间，还参加了一些业余的设计工作。如北京体育学院篮排球练习馆、中国儿童剧场改扩建工程、韩村河篮排球馆、网球馆和露天游泳场、中日友好医院的“鉴真花园”等设计，还有北京市大兴县西红门乡和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旅游景区等规划。同时，参加了建筑学院赴美国考察木建筑，以及到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等地区参观考察为《世界建筑》组稿。

如歌岁月

——回忆清华中长跑体育代表队

○王永乐（1968无线电）

1962年我入校不久就参加了体育代表队，在中长跑队的岁月中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，留下了我的感动与怀念。每次回到清华，总要去看看女队的宿舍——新斋和四号楼，总要到西大操场久久停留，仿佛耳边又响起了当年熟悉的广播声：“同学们！课外锻炼的时间到了，走出宿舍，走出教室，参加课外锻

炼！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！”仿佛又看到中长跑队的队友在操场上奔跑的矫健身姿。

如今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第一节课上的是什么内容，却不会忘记我和我的中长跑队队友曾经并肩活跃在这操场上，恣意奔跑，挥洒青春！也不会忘记我在中长跑队、在这操场上受到的培养教育。